

谁比赫本 更适合演“郝莉”?

文/本报记者 金丹丹

提到《蒂凡尼的早餐》，很多人眼前浮现的，是奥黛丽·赫本穿着优雅的黑色纪梵希小礼服裙，戴着长手套独自在清晨的纽约第五大街上对着蒂凡尼珠宝店吃牛皮纸袋里的面包。这部当年拿了7项奥斯卡奖的电影，曾被影评界誉为上世纪60年代美国最佳喜剧片，也一直被拿来当作永不过时的时尚着装教材。原著小说中文简体字版阔别内地读者近20年，最近引进出版，并得到了村上春树和张悦然的特别作序。



《蒂凡尼的早餐》
[美]杜鲁门卡波特 著
董乐山 朱子仪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8年10月第1版
定价:28元



《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
[美]白睿文(Michael Berry)著
罗祖珍 刘俊希 赵曼如 翻译整理
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39元

《光影言语》节选 谢晋 电影创作六十年

当您决定走上电影这条路的时候，您家里并不赞成。您能不能谈谈从戏剧转到电影的经过，以及您家里的反应？

最早我家里那五百本书里，有本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传记。我从小就想做个发明家，父亲非常高兴，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后来我看过两部爱迪生的传记电影，一部是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的《小爱迪生》(Young Tom Edison)，演童年的爱迪生，另一部是《伟人，爱迪生》(Edison the Man)，史宾塞·屈赛(Spencer Tracy)演成年的爱迪生。都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的，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接受抗战时的教育。所有的歌唱队、戏剧队，都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是非常激动。中学时代我就开始演话剧。我们中学里就有剧团，演独幕剧，很多都是老师编的戏。大学我念了中国唯一一个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这时学校已经从南京搬到四川重庆了。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就待了六年，我的夫人也是四川人，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我们学校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我最尊敬的老师包括洪深(1894—1955)，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教授(George Pierce Baker, 1866—1935)的学生。我另外一个老师是张骏祥(1910—)，后来当了上海电影局局长，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还有

光影创作者的故事

谢晋、杨德昌最后公开并且完整谈论电影的文字记录。作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也是著名学者王德威的学生。在这本访谈录里，他深

“用不了多久，蒂凡尼就会把我的书摆在橱窗里”

村上春树是卡波特的忠实粉丝。《蒂凡尼的早餐》小说日文版就是由他亲自翻译。在村上特地为中文简体字版写的6000字序言中，他说：“我反复读过好几遍文本，每次都为那精心打磨、简洁洗练的文字折服，真是百读不厌……我不禁数度赞叹‘太棒了’。”“在他的故事中，人们所怀有的纯洁及其不久之后的去处，被描绘得无比美好、无比悲伤。那是只有卡波特才能描绘出的特别世界。还是高中生的我就是被那个世界所吸引，才得以体会到小说这一事物的深奥之处。”

卡波特一生饱受争议，14岁开始为《纽约客》写作，20岁出头就成为文坛宠儿，享受着纽约社交圈的奢华生活，直到59岁因用药过度猝死在友人家中。

《蒂凡尼的早餐》是他第二段文学生涯的开始。他在1955年左右动笔写《蒂凡尼的早餐》，但进展并不顺利，各种杂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去了苏联、日本旅行，并采访了在日本拍片的马龙·白兰度，尖锐的访谈录出来后，令白兰度勃然大怒，并扬言要“宰了那个混帐小鬼”。1957年，他重新执笔写作《蒂凡尼的早餐》，于次年春天完成。小说原本预定一次性登在女性杂志《时尚芭莎》上，合同都订好了，杂志却突然变卦拒绝刊登。后来，小说刊登在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并创下了该杂志压倒性的销量。《时尚芭莎》拒绝刊登

的理由之一是郝莉·戈莱特利很难不被认为是个“高级娼妇”，而且文章多处提及同性恋，另一个理由是编辑们担心这会让大广告主蒂凡尼珠宝店不高兴。据说卡波特付之一笑：“用不了多久，蒂凡尼就会把我的书摆在橱窗里。”

想一想什么样的演员适合郝莉

《蒂凡尼的早餐》作为奥黛丽·赫本的代表作，让她第四次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郝莉的任性、虚荣、脆弱和天真，叫人惊喜，很多人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是给奥黛丽·赫本身量身定做一般。

事实上却是，卡波特其实并没有把郝莉设定为奥黛丽·赫本这样的女孩。据说，当年卡波特听到将由赫本来主演时，非常不高兴。村上春树说，“或许他认为郝莉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这位女演员本来并不具备。”

村上春树的建议是在看小说时尽量与电影拉开距离。他觉得郝莉“恐怕是杜鲁门·卡波特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最有魅力的人物，如果把她简单地等同为一位女演员——姑且不论当时的奥黛丽·赫本也很有魅力——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他的另一个希望是，有人愿意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将《蒂凡尼的早餐》再拍一次电影。“但下一次由谁来演郝莉·戈莱特利呢……却想不出具体的名字，真是很难。还请大家看书的时候，想一想什么样的演员适合郝莉。”

黄佐临(1906—1994)，他的女儿是知名的第五代导演黄蜀芹。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受到的很多教导都是西方的。还有一位是焦菊隐先生(1905—1975)，是舞台剧《茶馆》的导演，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我们的莎士比亚是曹禺(1910—1996)老师教的，《雷雨》的作者，他是教务主任，他最脍炙人口的《北京人》就是在我们学校写的。曹禺给我们上剧本课，介绍了易卜生(Henry J. Ibsen)、莎士比亚、奥尼尔(Eugene O'Neill)、契诃夫(Anton Chekov)等俄国、美国、英国的剧作家。我们毕业的时候演了很多易卜生和莎士比亚，还有曹禺先生的《日出》、《雷雨》。这些扎实的训练对我后来导戏、刻画角色性格帮助很大。这些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戏剧家，都在我们学校讲课，可以说我吸收的戏剧知识都是当时国家最好的戏剧家传授的，前后有五年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的电影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跟一般美国电影不完全一样，原因就是我是学戏剧的。

早几年我父亲在香港工作，地位很好，也比较有钱，不过我没有留在香港，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父亲因此觉得很失望，因为在过去，解放以前的社会，中国还是个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看不起演戏的。在我们学校，一个班才十几个人。我跟陈凯歌的爸爸是同一届的，我们1941年考上学校，一起念书，陈凯歌现在还叫我“叔叔”。当时念的人非常少，因为这个工作在过去的社会被人轻视、被人瞧不起。很多人问我，照理讲应该留在香

港，生活蛮好的啊，但我的决心很大，我要往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在那里三年，非常艰苦，饭都吃不饱，但是我们的学术风气很浓厚。

您盼望观众从您的电影里得到些什么？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文学一直有两派，一派审美的，一派审丑的。描绘丑陋的也可以教育人，就像《钦差大臣》(The Government Inspector)的作者果戈理(Nikolai Gogol)。我一般是审美派的，希望留下很好的东西，让观众永远记得。我在美国做过几次演讲。我说美国每年拍的几百部电影中，如果有一半像《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 1965)、《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 1940)、《居里夫人》(Madame Curie, 1943)或《北非谍影》(Casablanca, 1942)，也许，我说也许，九一一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美国的人文意识在美国更为健全，也许宗教的问题、种族仇恨的问题可以解决，九一一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音乐之声》这样的片子可以帮助陶冶人性，而不是那些枪战、暴力的电影占美国票房的百分之八十，我想世界会更好一点。

我总希望给观众很美好的电影，中国的观众喜欢我的电影是因为他们能懂。我一直希望贡献最美好的东西，因为中国人已经生活得太苦了，我一生的志业都希望经由我的电影、我的电影里美好的东西，给予他们一些希望。

度采访了20位当代华语片重要电影人，包括谢晋、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侯孝贤、杨德昌、关锦鹏等两岸三地的电影人，留下一份非常宝贵的口述史。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作序：“我看到白睿文对当代华语电影

有着极高的热诚，而他似乎就是为这段历史留下新页的不二人选。《光影言语》呈现出各个创作者的故事，清晰地表达出他们各自对个人作品、创作方式、灵感来源和遭遇困境时的看法。”